

研究综述

近百年以来中国侨批业研究综述^{*}

焦建华

(厦门大学 经济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关键词] 侨批; 侨汇; 批信局; 华侨

[摘要] 本文从民国时期、1949—1979年和20世纪80年代后三个时期, 回顾近百年来国内外有关中国侨批业的研究。作者认为, 已有的侨批业研究选题不够宽泛, 具体领域的研究不平衡, 研究理论有所欠缺。作者指出, 未来的侨批业研究应从资料收集、研究领域和研究理论等方面着手, 拓宽和加深相关研究。

[中图分类号] D63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2006)02-0049-10

A Historiographical Review of the Overseas Chinese's Remittances in the 20th Century

JIAO Jian-hua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Key words: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industry of overseas Chinese's remittances; remittances

Abstract: This paper gives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researches on the industry of overseas Chinese's remittances during recent 100 years, covering both the Republican period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an period.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e weakness in the present study, e. g., the narrow scope of the research, a state of imbalance between different specific topics, and the lack of theoretical approach, therefore, th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data collection, scope-extension and theory-formulation.

侨批业又称侨汇业, 是专门经营、传递华人移民侨批(书信、钱物)的私营商业性服务行业, 侨批及其经营机构是侨批业的基本构成要素。侨批俗称“番批”, 闽南语和潮州话称信为“批”, 因华侨寄信时一般会有汇款, 因而侨批既包括“信”, 又包括“钱”。侨批业的出现与侨汇和移民密切相关。目前所见最早的侨汇记载约在16世纪左右,^[1] 真正形成一个行业大概要追溯至19世纪上半期, 20世纪逐步进入鼎盛时期, 曾遍布中国闽粤桂等省以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平均每年有数千万美元经侨批业者汇入中国, 维系和改善了数以百万计的侨眷的生活, 对中国民

[收稿日期] 2005-12-21

[作者简介] 焦建华(1974), 男,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讲师。

* 侨汇是国际上常见的现象, 实际上就是移民汇款, 本文的研究范围仅限于中国海外移民的汇款, 即“侨”仅限于“华侨”, “侨汇”即为华侨汇款的简称, 不涉及其他国家的海外移民汇款; 侨批业是海外华侨汇款行业的专门术语。

主革命和经济建设也做出了巨大贡献^①。经营侨批业的组织即为批信局^②，主要分布于福建、广东、广西、香港和东南亚各地，其最初始创时间因年代久远且无可信的文献记载已不可考。有关侨批业的学术研究出现相对较晚，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呈现高潮，取得丰硕成果，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专著、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组织大批人员详细调查华侨投资国内企业情况，推进了侨批业的研究，然而不久就陷入沉寂。改革开放后，学界重新关注侨批业，不断引进新的理论，拓展研究范围，取得不少成果。本文以时间为分期，回顾百余年来的侨批业研究，分析已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并探讨未来研究的方向。^③

一、民国时期的侨批业研究

学界关注侨批业最初由华侨汇款引发。早在 1877 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参议会就对美国华侨汇款额进行估计，^[2]这是目前所见世人关注侨汇的最早纪录。随后，旧金山 Morning Call 报、马士 (Morse)、Wagel、See、Coons 和雷麦 (Remer) 等都对侨汇数额进行估算，^[3]其中以 1903 年马士和 1930 年雷麦的估算影响最大。马士以在外华侨人数乘以每人平均汇款数，以归国华侨每人携带侨汇数计算，或以华侨所驻地经济状况为标准进行估算，这种统计方法遭到后来学者的诸多批评；雷麦根据经营外汇的银行报告及对香港、厦门和汕头等地官营行局和东南亚的实地调查，对侨汇进行系统研究和估算。其估算方法和数据为学界广泛接受，常被借鉴和引用。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从国际贸易角度分析侨汇与中国对外收支的关系，此后侨汇始终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相关研究也奠定了侨批业研究的基础。

民国时期学界有关侨批业的论文颇多，就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粗略统计，专门论述侨汇和侨批业的期刊文章就有 128 篇，如果包括大量报刊文章，就达数百篇。就笔者所见，日资台湾银行早在 1914 年完成的调查，即《侨汇流通之研究》，^[4]较早完整论述侨批业。该书详细考察邮政局、批信局、银行、钱庄和银号等经营机构经营侨批业的情况，该书目的在于为日资台湾银行谋求发

① 学界对“侨汇”的具体内涵并没有严格的划分标准，《辞海》中将其解释为“侨民汇回祖国的款项”；雷麦界定为“海外华侨汇回中国的资金”，其中包括华工积蓄的资金、华商企业的利润和产业的进款；郑林宽界定为“海外投资及薪金所得，以及按期寄钱供养他们国内的亲属或家庭的费用”，“贸易及捐予的款子不算在内”；日资台湾银行的调查界定为“华侨以投资或劳力之所得，送回国内以供亲属或家族需用”的款项。吴春熙将其界定为“海外华侨的汇款，用以赡养家人或亲属，用于购买土地、房屋或投资工商业的款项”；林家劲等根据侨汇用途界定为：除赡养家费外，还包括捐赠、投资等其他形式的款项或实物。本文主要回顾侨批业研究，侨汇只是其中的部分内容，因而采用广义概念，即侨汇是华侨汇回国内的款项，其中包括赡家款、投资或捐赠等。以上界定分别参见：夏征农主编：《辞海》（1999 年版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 年，第 289 页；雷麦著，蒋学楷、赵康节译：《外人在华投资》，商务印书馆，1959 年，第 132 页；郑林宽：《福建华侨汇款》，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1940 年，第 24 页；杨建成主编：《三十年代南洋华侨侨汇投资调查报告书》，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3 年，第 39 页；Chur-his Wu, *Dollars Dependents and Dogma: Overseas Chinese Remittance to Communist China*, Stanford: 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1967, P. 15；林家劲等著：《近代广东侨汇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3 页。另外，华侨本指“侨居国外的中国公民”（夏征农主编：《辞海》，辞书出版社，2000 年，第 146 页），1955 年新中国政府和东南亚国家解决双重国籍问题，大多数华侨逐渐加入当地国籍，成为当地国民，因而“华侨汇款”的提法并不准确，学者为行文方便仍习惯沿用“侨汇”，这儿的“侨”并非严格法律意义上的国籍概念，相当于广义华人或华裔。

② 批信局因时因地名称各异，有“侨批局”、“银信局”、“批信局”、“民信局”、“信局”、“批局”、“侨信局”、“华侨民信局”、“汇兑信局”、“汇兑局”、“批馆”、“侨批馆”、“汇兑庄”等十多种，较正式的称呼为“民信局”或“批信局”。

③ 由于侨批业研究集中于中国大陆，因而本文以中国的历史发展作为划分标准，海外研究列入相关时段。另外，集邮界多研究侨批封，考证侨批封的邮戳、邮路、发行时间以及所反映的当时某些社会政治经济情况，本文不予采用。

展侨批业服务，因而特别关注各国银行的侨批业务，并论及侨汇货币兑换问题。国内迟至1929年才有杨起鹏的完整论述。^[5] 杨文详细探讨了汕头侨批业的组织结构、经营和管理方法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具体翔实。由于侨批业发展日益突出，国民政府外交部也开始调查海外侨批业的经营和发展状况，^[6] 广东省银行还出版专刊《广东省银行季刊》第3卷第10期，1947年）予以探讨。学界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刘伯奎全面论述侨汇的成因和侨汇机构的演变，分析侨汇用途并对此进行检讨反思。^[7] 何启拔集中探讨批信局组织及其业务，认为批信局并非一种创造性的特殊侨汇机构，而是固有文化的遗俗；不是经济性、而是社会性的金融组织，经济性是其结构的功能，社会性是其结构的动力。^[8] 这种观点颇有见地，对于我们认识侨批业及其经营组织极有启发。战后侨汇逃避非常普遍，学者对此讨论很多。姚枬详细探讨了防止侨汇逃避的途径和方法，提出治标和治本之法，即简化手续、增设银行机构、利用批信局等临时措施和改革政治、保护侨资、外交交涉取消限制、组织侨汇网等长远措施，希冀解决侨汇逃避问题；^[9] 杨尔琨着重分析抗日战争前后侨汇数额的变化及其萎缩原因，认为侨汇萎缩是因为两个因素：其一，侨民海外事业因战争损失大以及各国开始限制汇款；其二，汇价与黑市差价大，侨汇逃避多。基于此，作者提出促进侨汇的措施与途径，如帮助侨民事业复兴、与所在国交涉、采取各种措施防止侨汇逃避等。^[10] 其他类似论文颇多，如季龙、陈葆灵等的论文。^[11] 这一时期的研究以吴承禧的《厦门的华侨汇款与金融机构》最为突出。^[12] 作者1936年到厦门实地调查华侨汇款和金融组织，首次从当时的金融体系考察侨批业，揭示侨汇在金融市场上的流通情况；详细分析厦门侨汇占全国侨汇的比重，论证了厦门侨汇与对外贸易、汇兑和金银流动等的联系；分析了厦门的批信局、钱庄、国内银行和外国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组织、经营特点以及与侨汇的互动关系。该文研究思路和角度都值得肯定。

国民政府时期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侨批业研究专著，最突出的要数郑林宽著《福建华侨汇款》和姚曾荫著《广东省的华侨汇款》。^[13] 郑著充分吸收雷麦、吴承禧等人的研究成果，并利用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的有利条件，较深入细致地论述福建侨汇的数量、汇款者的构成、侨汇的用途、侨汇对福建侨乡社会经济、生活习俗等的影响、侨汇机构与侨汇手续以及福建吸纳华侨资本的能力等。作者对1905—1938年间福建侨汇的数量、来源、分布和用途作了较科学的估算，这一估算至今仍被学界视为最具权威性，并广为引用。作者深入研究了各种不同侨汇机构间的竞争与协调关系，并提出不少独到之见。另外，该书附录的39个图表，内容广泛，为侨批业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该书也是当时福建侨批业最完整和系统的著作。姚著结合当时的金融、邮政和贸易体系系统论述广府和潮汕地区的侨批业运营；阐明了侨批业经营的多种方式（兑换方式、卖港单或省单之法、运货抵帐和送现接济），集中论述潮汕侨汇“上盘生意”的操作方式，并比较汕头与厦门侨批业经营的不同之处。

一些银行工作人员利用业务之便撰写的侨批业著作也值得关注，如中国银行泉州支行经理张公量著《关于闽南侨汇》和广东省银行经理刘佐人著《金融与侨汇综论》。^[14] 前者详细论述了闽南侨批业的发展历程，包括华侨汇款和批信局的起源、侨批业组织以及中行泉州支行办理侨汇的经过等；后者为论文集，作者从当时金融体系和贸易体系等角度分析了侨汇逃避与资金南逃的内在联系，提出了改善侨汇的具体途径等。该书最精彩之处是对批信局侨汇业务的研究，详细分析批信局的内部组织、具体分布、经营过程以及经营方法。由于作者都是银行职员，直接参与金融业务，资料翔实，叙述较可靠，观点也较新颖。

同时期日本的侨批业研究也颇突出。1943年，日资台湾银行继1914年报告后又完成了《三十年代南洋华侨侨汇投资调查报告书》，^[15] 主要调查华侨侨汇投资情况，尤其是抗战时期的侨汇，调查者注意到地位日益突出的政府侨汇经营和以货代款的汇款新方式。该调查报告虽然论述缺乏深度，但资料丰富翔实，是研究侨批业不可多得的宝贵史料。

另外，部分文章和论著虽非专门研究，但也涉及侨批业，相关论述也颇值得借鉴。如陈达的中文专著《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和英文专著《南中国的移民社会》^[6]，详细调查和探讨了侨汇的用途以及侨汇对侨乡生活水平、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影响等问题。

二、1949—1979年的侨批业研究

新中国建立之初，国内还有不少侨批业研究成果问世，但只是短暂现象，随后研究转入沉寂，直至20世纪80年代国内才重新有研究成果出现。就笔者所见，这一时期的期刊论文不到20篇，报刊报道也不多。然而，其中也有一些较高质量的研究。如向阳详细研究了不同时期批信局的利润；^[17]冯肇伯采用比较方法分析东南亚与美洲的侨汇机构、侨汇数额和侨汇政策等方面的差异及原因^[18]。国外学者也有研究成果出现，高维廉探讨了马来亚华侨汇款与中马贸易间的关系，肯定侨汇的积极作用；^[19]柯木林利用新加坡的文献及访谈资料，详细研究1946—1949年新加坡侨批业由盛而衰的过程，对新加坡侨批业的产生、不同时期的发展状况和殖民地政府的侨批业政策都提出一些独到见解，并保留很多新加坡侨批业的历史资料，是侨批业研究者必读之文。^[20]

新中国政府对侨汇非常重视，为了争取侨汇和方便侨务工作，先后组织人员对各地侨批业进行调查，取得很多成果。如厦门侨务局在20世纪50年代对厦门侨批业进行详细调查，内容包括1950年前厦门侨批业的发展情况、具体经营、东南亚国家的侨批业政策和侨汇逃避以及华侨、侨眷的意见和要求等，是很好的研究资料；^[21]福建省政府先后组织人员编写《侨批业社会主义改造史料（1949—1958）》和《福建批信局历史资料》等，尽管报告的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偏颇之处甚多，当时也未公开，但保留了很多侨批业的资料，是研究福建侨批业宝贵的原始资料；厦门中国银行先后编印《侨汇资料汇编》三辑，^[22]保留了一些当时侨汇经营的具体资料。建国后规模最大的一场调查是1958—1962年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组织的，由庄为玠和林金枝负责。他们受国家科学技术规划委员会之托，组织厦门大学部分师生在福建、广东48个市县的侨乡以及上海等地调查整理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随后整理出《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初稿，按地区编排分为福建、广东和上海三卷，遗憾的是这批成果当时并没有产生应有的研究效应，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问世并被广泛利用。另外，有些调查部分涉及侨批业，对研究有借鉴作用。如厦门大学的章振乾、陈克俭、甘重民、陈可琨等人组成的调查小组于1956年冬对晋江专区和厦门两地的若干重点侨乡展开调查，调查报告部分章节也探讨了建国后侨汇对侨乡的影响。^[23]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侨务委员会”也组织人员先后编写了《“共匪”侨汇的研究》和《侨汇的研究》。^[24]前者系统研究1949—1968年中国大陆的侨批业和侨汇状况，详细统计中国大陆历年的侨汇，分析华侨社会变迁对侨汇的影响，并对侨批业政策进行评介和研究；后者除关注中国大陆的侨汇外，还分析国民党迁台后的侨批业政策以及侨汇对台湾经济发展的作用。两书虽然意识形态色彩浓厚（从书名就可得知），存在诸多偏颇之处，但拓宽了侨批业研究的时段和领域，值得借鉴。

另外，美国华裔学者吴春熙的研究也比较突出。^[25]作者利用当时美国、东南亚、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各种资料，探讨新中国建立后侨批业的发展状况，对1949—1963年中国大陆的侨汇数额进行统计或估算，探讨新中国的侨批业政策及其对侨汇的影响。该书研究深入，资料较翔实，是研究建国后至“文革”前中国大陆侨批业发展的重要专著。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国内侨批业研究虽然趋于沉寂，但是调查发掘了一批具体资料；台湾地区和海外侨批业的研究范围和视角都有所拓宽，有利于侨批业的更深入研究。

三、1980年至今的侨批业研究

1980年后，随着国内学术环境日渐宽松，新的侨批业资料不断面世，侨批业研究又开始兴

旺,研究成果日益增多,研究的时间跨度、范围和视角都有所拓展,出现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极有深度的成果。然而,总体质量并不高,很多或属描述介绍性,或重复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

有关侨批业发展历程的研究。首先是侨批和侨批业的起源研究,杜桂芳利用原始批信,从心理角度分析华侨的权利与义务,探讨潮汕侨批的起源及其发展,^[29]对认识侨批起源有积极作用;陈训先从潮州人“根”意识的递变、“智”潜能的优化组合和“商”思想的灵活应用等方面论述侨批业的起源。^[27]这些研究主要限于潮汕地区,但是文化特征具有普遍性,有助于认识其他地区侨批和侨批业的起源。然而,侨批业起源研究也显示出一些倾向,即归结为文化和信用等因素,内容比较宽泛和空洞。其次是侨批业总体发展历程研究。虽然大多研究属描述性,深度不够,但也偶有较好之作。如吴同永叙述1949—1985年福建省侨批业的历史和当代发展情况,^[28]该文研究时段一直延续至1985年,涉及新中国侨批业的发展,值得肯定。黄清海和林春森分别探讨了福建泉州和厦门的侨批业发展情况;^[29]前者简要概括泉州侨批业的产生、兴盛和最后消亡过程,资料相对翔实,叙述清晰;后者简要探讨厦门侨批业的形成与发展、侨批业的组织形式与经营管理以及1945—1949年间厦门侨批业的情况,文章深度有所欠缺。另外,厦门大学历史系申显扬撰写了题为《论近代闽南侨批业》的硕士论文,探讨闽南侨汇的产生、数额及历史影响等。^[30]袁丁、陈丽园先后发表一系列论文,集中讨论广东侨批业经营体系的重建和失败及二战后侨汇逃避的产生及其原因、主要趋向和终结等问题,^[31]对研究二战后侨批业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学者对侨批业组织——批信局的研究也不断加深。林真利用福建省档案馆所藏的丰富档案,详细论述批信局的萌芽、逐步发展、艰难发展、畸形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以及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和形式,作者认为批信局因海外华侨与国内家眷、居留国与祖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血缘、地缘、业缘等原因产生和发展,肯定其在沟通海内外联系方面的桥梁作用和争取侨汇中的历史作用;^[32]焦建华分别探讨了侨批业的经营制度、经营特色及其制度创新与文化传统之间密切的内在联系;^[33]袁丁、陈丽园探讨政府与批信局的关系,指出1946—1949年国民政府为了打击侨汇黑市、解决侨汇逃避问题,对批信局采取既限制又利用的政策,因恶性通货膨胀最后失败。^[33]这是首次从政企关系角度探讨近代批信局的发展。台湾学者彭瀛添对海外批信局的产生、发展与变化以及批信局与中国邮政局之间的斗争有所探讨,^[34]这是首次从邮政史角度探讨批信局的民信业务。

新材料和新视角有助于拓宽和加深侨批业的研究。广东省档案馆收藏了丰富的侨批业档案资料,林家劲等人利用这批资料合作出版《近代广东侨汇研究》^[35],这是1949年后国内首次系统研究近代广东侨批业的著作,该书资料新而丰富,但论述“大而全”,在理论框架和论述深度方面存在明显欠缺。陈春声利用这批资料详细探讨清末至民国年间广东潮汕地区侨批业经营与运作的若干侧面,分析批信局运营实态及其内部机制。^[36]借助现代化理论,学者们开始关注批信局的传统性与现代性问题。何启拔1947年就提出批信局是固有文化遗俗的观点,但缺乏严密论证。滨下武志以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合会”和批信局为例分析华人金融的特点和性质,认为批信局是传统区域社会对外联系的金融组织,其内部组织、经营方法都具有传统社会的特征。^[37]戴一峰以二十世纪上半期批信局与厦门中国银行(即“闽行”)的关系为中心,详细探讨批信局与银行之间竞争、合作、利用、借鉴及共生等多重关系,由此认为,“现代”与“传统”简单对立的模式存在偏颇,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非常复杂多样,有合作、互补、融合和共生的一面,传统中也包含许多积极、推进性的因素。^[38]滨下武志重在论述批信局的传统性,戴一峰则将理论与批信局个案有机结合,从批信局与银行的关系中透视传统中的现代性,该研究不论对现代化理论,还是批信局研究都有裨益。

随着20世纪90年代华商网络理论的提出,学者们也开始将其应用到批信局研究中。戴一峰采用新经济社会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探讨非正式制度对批信局组建的影响以及批信局与社会网

络之间的关系，认为批信局借助社会纽带将自身网络化，并使其商业活动结构性地嵌入华人跨国社会；^[39]在戴一峰的指导或影响下，张军和焦建华分别撰写有关侨批业的硕士论文，探讨侨批业网络的组织结构及具体运作以及侨批业网络与银行及邮局的关系，^[40]论文虽然视角独特，但资料存在欠缺，论述深度明显不够。马明达和黄泽纯分析了潮汕批信局经营网络的组成和结构；^[41]陈丽园借用网络理论延伸了有关政企关系的讨论，详细论述1927—1949年潮汕侨批网络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交锋、依存以及国家控制的失败，展示二者间的紧张和合作关系，指出国家体系和民间商业网络若明确各自的活动空间，充分发挥优势可能会出现良性互动。^[42]

另外，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所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虽非专门论述侨批业的著作，但是作者新的视野和理论方法颇值得借鉴。作者将东亚和东南亚作为一个整体，从亚洲经济圈的视角讨论侨汇与亚洲金融贸易体系的关系，认为侨汇加强了早已存在的亚洲金融贸易体系，外商银行参与侨批业经营又促进以新加坡、香港和上海为中转站的亚洲地区金融体系的形成，并使之连接欧美金融体系，从而反过来影响侨汇发展。^[43]

这一时期的其他研究对侨汇数额的估算、侨汇用途和侨汇的历史地位予以极大关注。林金枝先后发表一系列文章，详细探讨1949年前福建侨汇款额、特点、侨汇用途和侨汇的历史地位，对批信局经营方式有所涉及。^[43]朱东芹着重分析1946—1949年国民政府汇率政策与侨汇的关系，指出因恶性通货膨胀和不断恶化的财政经济形势，侨汇优惠政策最终失败，侨汇逐年减少且大部分逃入黑市；^[44]冯元对国民政府时期侨汇的经营、统计以及广东的侨汇用途都做了详细探讨，指出侨汇与侨乡生产不发展之间存在恶性循环。^[45]陈衍德探讨侨汇和华侨投资对厦门经济生活的综合影响，认为其促成了厦门城市的消费性。^[46]王付兵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福建侨汇的规模、地位以及用途，这是对改革开放后福建侨汇比较完整的探讨^[47]；丘立本从国际侨汇数量与侨汇作用的变化以及我国侨汇数量的变化，探讨我国侨汇政策的得失，并提出相关改进措施。^[48]杨世红考察了1949—1961年间新中国保护侨眷的利益、争取侨汇的侨务政策和历史进程。^[49]这些研究有助于厘清和认识侨批业不同历史时期发展的具体情况和趋势，即使某些研究仅仅涉及侨批业。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发掘、整理和出版了大量的侨批业资料。泉州中国银行先后整理出版《泉州侨批业史料》、《闽南侨批业纪述》两本侨批业资料专辑，专辑除收集公开出版的资料、档案资料外，还收录了诸多侨批员和有关人员的回忆或记述以及相关的口述材料等，这些资料弥足珍贵，对福建侨批业研究不可或缺；汕头“潮汕文化研究中心”专门收集、整理和研究侨批，先后整理出版了《潮汕地区侨批业资料》、《潮汕侨批萃编》（共二辑）、《潮帮批信局》等侨批业资料专辑，并发行侨批业研究专刊《侨批文化》，还在2003年成立了“潮汕侨批馆”。同期出版的其他涉及侨批业的资料选辑有：《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福建、广东和上海卷）（1985、1989、1994年）、《福建华侨档案史料》（上下卷）（1990年）、《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三册）（1991年）、《中国银行福建行史资料汇编（1914—1949）》（1991年）、《四联总处史料》（上下卷）（1993年）、《交通银行史料》（1995年）、《中国银行厦门市分行行史资料汇编》（三卷）（1999年）以及福建和广东各地的《华侨志》。如福建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厦门华侨志》（1991年）、《福建省华侨志》（1992年）、《同安华侨志》（1992年）、《晋江华侨志》（1994年）、《安溪华侨志》（1994年）和《泉州市华侨志》（1996年）等，这些资料选辑和华侨志中包含大量的侨批业资料。此外，在政协主持下，各地侨乡先后出版了相应的《文史资料》，其中也保留了部分相当珍贵的侨批业口述和回忆材料。

四、对已有研究的探讨及未来研究的展望

从以上回顾可以看出，侨批业研究从20世纪初发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进入高潮，1949年后趋于沉寂，20世纪80年代后又见“兴旺”。笔者就已有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研究的方向

提出初步看法。

首先是选题问题。笔者查阅从 20 世纪初至今的有关侨批业研究的期刊论文 189 篇（不包括文史资料），根据研究内容和涉及的时间粗略分类统计^①，制成表一：

表一：侨批业研究论文统计表（单位：篇）

内容 时段	侨 汇		批信局	综 合	合 计
	数额	作用			
建国前	64	21	15	60	160
建国后	2	1	1	15	19
跨越前后	6	2	1	2	11
合 计	72	24	17	77	190

从表中可以看出，学者研究内容明显偏重于新中国建立前的侨批业，在 190 篇期刊论文中，关注新中国建立前侨批业的研究文章为 160 篇，占 84.3%。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因为 1949 年前侨批业的发展和作用都非常突出，资料获得也较方便，吸引大批研究者加入，研究成果相对较多。建国后侨批业的发展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受到严格限制，而且国内政

治和经济形势变化很大。此外，新中国从 1955 年起与东南亚国家逐步解决双重国籍问题，大批华侨相继认同于当地，原来的华侨转变为外籍华人，侨汇数额逐年减少，中国大陆 1982—1999 年侨汇收入总额只有 110 亿美元。^[59]

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后，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外币存款逐渐增多，外汇储备迅猛增长，国家对侨汇的依存度极大降低。侨汇只作为一般外汇由国家外汇管理局掌管。侨汇作为一般资金流动，属普通金融工作范畴，并未予以过多关注，而且各级政府工作重点在于吸引外国投资，侨务部门也不例外，除了关心华侨华人捐赠公益事业外，侨务工作很少提及侨汇问题。实际上，部分侨汇也以外资形式合法或通过地下钱庄非法流入中国，境外汇入的可自由兑换外汇已不再是华侨赡养家属的汇款，而是通过银行或其他汇款机构的多种形式汇款，很难掌握准确翔实的资料，但应指出的是，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末，进入中国的外资中有 60—70% 是港台资本，直接来自东南亚华人的资本不到 4%。^[51]再者，物资供应极大改善，侨眷生活水平已极大提高，也不需依赖侨汇维系生存，政府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还实行的侨汇券、侨汇商店等各种优惠措施也逐渐销声匿迹。总之，建国后的侨汇资料相对有限，因而没有多少人认真加以研究。

其次是研究主题分布不均衡。学者多关注侨汇问题，侨汇数额和作用的相关研究多达 96 篇（如果严格划分，数目更多），占 51%，即过半数的文章关注侨汇，主要集中于侨汇款额的统计与估算、款额变化及其原因、侨汇用途及历史地位等。批信局的研究为 17 篇，不足 1%，其中探讨批信局与政府机构关系的文章就更少，只有两三篇，明显欠缺。总体而言，批信局研究多为介绍性，总体缺乏高质量、有深度的研究和论述，主要关注其性质、内部组织、发展概貌、演变过程、国家政策和侨汇业务等，但都只有一两篇文章，极需加强。笔者认为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至少有以下三点：

（1）侨汇方式与途径复杂，特别是私人侨汇渠道众多，因而无法对侨汇款额作全面且准确的统计，但是侨汇对中国社会经济影响巨大，款额是最基础的部分。中国国际收支长期逆差，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经济发展，国人对争取经济权益非常敏感和重视，学者也不例外，力图对款额做出接近实际的估算。学者和政府一直试图估计出较真实的数目，因此涉及华侨汇款的研究必然会涉及侨汇款额和款额变化的原因。

① 由于一篇论文可能涉及多方面内容，本文采用以文章集中探讨的内容作为粗略的分类标准，侨汇类限侨汇数额和历史作用，其中前者包括侨汇款额统计、估算、款额变化及其原因和相关措施；作用主要指对国家外贸、经济与侨乡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作用及其历史地位。除侨汇数额、作用和批信局研究之外的所有内容属综合部分。

(2) 当时学者对批信局的价值取向非常清楚：一般认为传统的和旧的金融机构迟早要消亡，工作重点在于“现代”部分，而不是关注早已过气的事物，自然谈不上重视资料的发掘、保存和详细调查研究，这也造成后人研究缺乏资料。

(3) 批信局一般组织规模较小，经营较隐秘，“往往不肯将营业的实际情形告诉旁人”，^[52] 外人很难对其有深入和足够的了解；同时华人经营管理很少留下翔实的文字材料，这也给学者研究增加了难度。

其三，研究理论有所欠缺。侨批业研究多采用叙述和比较方法，关注于侨批业的发展脉络和具体经营过程，研究深度有所欠缺。值得指出的是，当代学者开始借用其他理论来研究侨批业，如现代化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新经济社会学和网络理论等，采用新的理论无疑对侨批业研究具有积极作用。

因此，未来的侨批业研究一方面应注重档案和其他资料的发掘和开发，努力从民间收集原始资料，并对原来的侨批业者进行调查和采访，进行口述史研究，这个工作必须抓紧时间进行，因为大多数业者已故去，幸存人数已经很少；另一方面，侨批业研究应努力拓宽研究领域和范围，不应仅限于“侨”，而应扩展到华人或华裔，除了继续从金融、外贸以及当地经济发展等角度研究侨批业的发展与影响外，也要从投资角度重新审视华人资本，注意研究华资与中国经济以及与当地经济的互动，更要立足于全球，从国际移民和资本流动角度探讨侨汇业的发展，比较各国侨汇业的异同，探讨全球化形势下侨汇业新的发展，同时积极引进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加强研究的深度。总之，未来的侨批业研究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注释]

- [1] 目前所见最早的侨汇记载是福建省石狮市大仑《蔡氏族谱》，该家谱记载了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年）菲律宾华侨汇款回家的情况，“思叔弟也……娶妇后，遂往吕宋求贵，叠寄润于兄弟，二兄景超全家赖之，修理旧宇，俾有宁居。”从行文判断，其中的“润”即为款项，用于“修理旧宇”，这是目前我国所见侨汇的最早记载。见林金枝、庄为玠：《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资料选辑》（福建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页。
- [2] Memorial of the California Senate 1877，转引自姚曾荫：《广东省的华侨汇款》，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年，第31页。
- [3] San Francisco Morning Call, 1882; H. B. Morse, *An Inquiry into the Commercial Liabilities and Assets of China in International Trade*, Shanghai: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1904 pp. 11—15; *China and the Far East*, New York: Clark University Lectures 1910 P. 107; S. R. Wagle, *Fiance in China*, Shanghai: North China Daily News and Herald, 1914 pp. 473—474; C. S. See, *The Foreign in China*, New York, 1919 pp. 334—336; C. F. Remer, *The Foreign Trade of China*,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1926; Arthur Gardiner Coons, *The Foreign Public Debt of Chin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30 p. 183; C. F. Remer, *Foreign Investments in China*, New York: MacMillan, 1933.
- [4] 杨建成主编：《侨汇流通之研究》，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4年。
- [5] 杨起鹏：《汕头银业史略及其组织》，《银行周报》1929年第13卷第14、15期。
- [6] 如《缅甸华侨汇款回国方法之调查》、《十九年巨港华人汇兑业概况及每月汇回款额统计》、《华侨近年汇款回国之调查》，分别见《外交部公报》1930年第3卷第6期、1931年第4卷第6期、1934年第7卷第3期。
- [7] 刘伯奎：《侨汇之回顾与前瞻》，《经济汇报》1943年第8卷第6期。
- [8] 何启拔：《批信局的组织及其业务》，《广东省银行季刊》1947年第3卷第10期。
- [9] 姚枬：《侨汇改进之途径》，《广东省银行季刊》1947年第3卷第10期。
- [10] 杨尔程：《侨汇问题研究》，《中央银行月报》1947年新2卷第2期。
- [11] 季龙：《南洋侨汇问题》，探讨汇率对侨汇的影响；陈葆灵：《侨汇萎缩与侨汇逃避》，伍凌羽：《今后的侨汇问题》，均参见《广东省银行季刊》1947年第3卷第10期；国民政府驻仰光领事馆详细调查了缅甸华侨汇

- 款回国的方法,《缅甸华侨汇款回国方法之调查》,《外交部公报》1934年第7卷第3期。
- [12] 吴承禧:《厦门的华侨汇款与金融组织》,《社会科学杂志》1938年第8卷第2期。作者其他论述侨汇较有影响的论文有《厦门的华侨汇款》,《华侨半月刊》1937年第98期;《最近五年华侨汇款的一个估计》,《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7年第3卷第3期。
- [13] 郑林宽:《福建华侨汇款》,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1940年;姚曾荫:《广东省的华侨汇款》,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年。
- [14] 张公量:《关于闽南侨汇》,中国银行泉州支行,1993年;刘佐人:《金融与侨汇综论》,广东省银行,1947年,主要文章为《侨汇问题》、《批信局侨汇业务研究》和《争取南洋侨汇问题》,相关文章曾刊登在1947年《广东省银行季刊》第3卷第10期上,由于作者是银行职员,列入著作类便于论述。
- [15] 杨建成主编:《三十年代南洋华侨侨汇投资调查报告书》,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3年。
- [16] 陈达:《浪迹十年》,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13、156—160页;《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Ta Chen, *Emigrant communities in south China: a study of overseas migr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standards of living and social change*,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0.
- [17] 向阳:《侨批局利润研究》,《经济导报周刊》1949年第129期。
- [18] 冯肇伯:《南洋侨汇与美洲侨汇》,《社会经济研究》1951年第2期。
- [19] 高维廉:《马来亚侨汇与中马贸易之展望》,新加坡中南联合出版社,1950年。
- [20] 柯木林:《新加坡侨汇与民信业研究》,柯木林等著:《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72年。
- [21] 厦门侨务局资料组:《厦门侨汇材料及意见》,厦门档案馆藏,全宗号66,目录号1,案卷号1。
- [22] 厦门中国银行:《侨汇资料汇编》(共三辑),厦门华侨服务社,1950年。
- [23] 章振乾、陈克俭、甘重民、陈可琨等:《福建主要侨区农村经济探论——侨区农村调查之一》,《厦门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
- [24] 何雨文:《“共匪”侨汇的研究》,台北“侨务委员会”“敌情”研究会,1969年;黄定文:《侨汇的研究》,台北“侨务委员会”研究发展考核处,1970年。
- [25] Chun-his Wu, *Dollars Dependents and Dogma: Overseas Chinese Remittance to Communist China*, Stanford: 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1967.
- [26] 杜桂芳:《潮汕侨批:义务与权利——以强烈的心理需求为特征的家族观念》,《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另外,作者其他文章系研究侨批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如《侨批——潮汕历史文化的奇观》,《东南亚研究》1995年第6期。
- [27] 陈训先:《论侨批的起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
- [28] 吴同永:《福建省侨汇的历史和现状》,《华侨历史论丛》1987年第4期。
- [29] 黄清海:《泉州侨批业史初探》,《八桂侨史》1995年第1期;林春森:《厦门侨批业概要》,《厦门特区金融》1986年第1期;类似的文章如吴永同:《侨汇发展变化浅析》,《东南亚华人经济》1989年。
- [30] 申显扬:《论近代闽南侨批业》,黄福才指导,厦门大学1998年硕士论文(未刊稿)。
- [31] 袁丁、陈丽园:《战后国民政府侨汇体系的重建》,《八桂侨刊》2001年第2期;《1946—1949年广东侨汇逃避问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1946—1949年间东南亚及美洲侨汇逃避的原因》,《东南亚纵横》2002年第6期;《“侨汇逃避问题”的终结》,《八桂侨刊》2002年第2期。
- [32] 林真:《福建批信局述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
- [33] 焦建华:《近代批信局特色探源——以福建为中心》,《福建论坛》2005年第5期;《制度创新与文化传统:试析近代批信局的经营制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3期。
- [33] 袁丁、陈丽园:《1946—1949年国民政府对侨批局的政策》,《南洋问题研究》2001年第3期。
- [34] 彭瀛添:《民信局发展史——中国的民间通讯事业》,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92年。
- [35] 林家劲、罗汝材、陈树森、潘一宁、何安举著:《近代广东侨汇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据该书前言所叙,与台湾学者夏诚华所著《近代广东省侨汇研究(1862—1949)——以广、潮、梅、琼地区为例》(新加坡南洋学会,1992年)有版权争议,本文暂取本书之说。
- [36] 陈春声:《近代华侨汇款与侨批业的经营——以潮汕地区的研究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

4 期。

- [37] 滨下武志:《传统社会与庶民金融——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合会”与“银信汇兑”》,《华侨华人历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1985年。
- [38] 戴一峰:《传统与现代: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变迁的再思考——以侨批局与银行关系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 [39] 戴一峰:《网络化企业与嵌入性:近代侨批局的制度建构(1850s—1940s)》,《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
- [40] 张军:《近代中国侨批业研究》,戴一峰指导,厦门大学2001年硕士论文(未刊稿);焦建华:《19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前10年的新中经贸关系——以新加坡为中心的华商网络个案研究》,宋平指导,厦门大学2002年硕士论文(未刊稿)。
- [41] 马明达、黄泽纯:《潮汕侨批局的经营网络》,《暨南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1期。
- [42] 陈丽园:《潮汕侨批网络与国家控制(1927—1949)》,《汕头大学学报》2003年社科版增刊。
- [43] [日]滨下武志著,朱荫贵、欧阳菲译:《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制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 [43] 林金枝:《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东南亚华侨汇款及其作用》,《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3期;《略论近代厦门的华侨汇款及其作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略论近代福建华侨汇款》、《析华侨汇款及其作用》,《八桂侨史》1996年第3期。
- [44] 朱东芹:《战后国民政府的外汇政策与侨汇》,《南洋问题研究》2002年第2期。
- [45] 冯元:《略论解放前广东省华侨汇款》,《侨史学报》1987年第1期。
- [46] 陈衍德:《民国时期华侨在厦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其他涉及侨汇与当地社会经济关系的类似论文很多,如戴一峰:《闽南华侨与近代厦门城市经济的发展》,《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
- [47] 王付兵:《改革开放以来的福建侨汇》,《八桂侨刊》2002年第3期。
- [48] 丘立本:《从国际侨汇新动向看我国侨汇政策》,《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
- [49] 杨世红:《新中国侨汇工作的历史考察(1949—1961)》,《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
- [5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收支平衡统计年鉴,IMF, Balance of Payments Statistics Yearbook Annual, 转引自丘立本:《从国际侨汇新动向看我国侨汇政策》,《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
- [51] 郭梁:《东南亚华人经济简史》,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27—229页。
- [52] 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91页。

· 书 讯 ·

《冲突与融合——菲华商联总会与战后菲华社会的发展》出版

华侨大学朱东芹博士的新著《冲突与融合——菲华商联总会与战后菲华社会的发展》已于2005年11月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共分七章、28万余字。

该书将商总与战后菲华社会的发展分为华社冲突和商总的诞生(1945—1954年)、商总的初创时期(1954—1966年)、华社的团结和商总的成长时期(1966—1975年)、华菲融合和商总的稳定时期(1975—1994年)、商总和菲华社会的转折时期(1994—1998年)以及世纪之交的商总和华社(1998年以来)六个时期,运用社会学冲突理论深入分析了各时期商总和菲华社会的发展特点。作者认为,战后以来菲华社会面对的外部及内部冲突总体上呈现出减缓的趋势。该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对了解战后菲华商联总会与菲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雷雨)